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玉田县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玉田县政协文史工作组编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目 录

- 玉田县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……………张明远(2)
- 冀东敌后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
——忆《救国报》的创始人马吟南烈士……白 萍(35)
- 兴办公众教育事业, 启发人民群众觉醒
——革命元老江浩在玉田的活动片断……袁春普(43)
- 碧血映忠魂——记英勇壮烈的双铺之战……吉 予(48)
- 我国清代的解剖学、医学家
——王清任生平介绍……………张忠勋(52)
- 我的皮影艺术生涯……………张茂兰口述 张瑞琪 整理(66)
孟昭林
- 建国前玉田职业戏曲班社述要……………孟昭林(79)
- 家乡教育情况回忆——兼述我的治教生涯……夏述先(90)
- 玉田史话……………张树云(98)
- 净觉寺小志……………孙汝举(111)
- 对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些回忆……………杨启东(114)
- 辛亥革命至建国前玉田县交通概况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玉田县交通局编史组(120)
- 玉田县古文化遗址遗存……………张忠勋(129)
- 编后话……………(139)

目 录

- 玉田县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……………张明远(2)
- 冀东敌后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
——忆《救国报》的创始人马吟南烈士……白 萍(35)
- 兴办公众教育事业, 启发人民群众觉醒
——革命元老江浩在玉田的活动片断……袁春普(43)
- 碧血映忠魂——记英勇壮烈的双铺之战……………吉 予(48)
- 我国清代的解剖学、医学家
——王清任生平介绍……………张忠勋(52)
- 我的皮影艺术生涯……………张茂兰口述 张瑞琪 整理(66)
孟昭林
- 建国前玉田职业戏曲班社述要……………孟昭林(79)
- 家乡教育情况回忆——兼述我的治教生涯……………夏述先(90)
- 玉田史话……………张树云(98)
- 净觉寺小志……………孙汝举(111)
- 对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些回忆……………杨启东(114)
- 辛亥革命至建国前玉田县交通概况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玉田县交通局编史组(120)
- 玉田县古文化遗址遗存……………张忠勋(129)
- 编后话……………(139)

玉田县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

张明远

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玉田县是农民革命运动发展较快、规模较大的地区之一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广大农民进行了反对军阀统治、打倒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、抗捐抗税和清算、夺取村政权等斗争。在斗争中，以农民会的形式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，并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，争得了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，不同程度地削弱、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，以积极的斗争配合了北伐战争。

国民党叛变革命后，这里的党组织执行了党中央的“八七”紧急会议指示，配合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响应南方农民的秋收暴动号召，领导广大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，曾一度攻占玉田县城，在北方第一个举起土地革命的红旗，进行了打土豪、分财产的武装斗争。这次斗争，虽然因为主观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，为时不久即遭失败，我党的一些优秀干部英勇牺牲，但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北方农民运动历史上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为以后冀东人民的武装革命斗争，点燃了燎原之火。

因为手边没有多少资料可查，仅凭记忆，难免与当时情节有所出入，或有遗漏和看法上的错误，请有关同志给以补充、指正和批评。

农民的深重苦难

玉田县地处关内外咽喉地带，毗邻京、津、唐，为历年

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必经之地。因此，这一带的农民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军阀混战的苦难，以及农村封建势力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。每年都有大量的破产农民被迫流往北京、天津、唐山、热河以及东北，甚至沙俄等地去谋生。概括起来，当时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所受的压迫与剥削，主要来自三方面。

首先是军阀连年混战带来的灾难。自1920年至1925年间，以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利益为背景的北方军阀各派系间的混战，特别是以冀东为主要战场的直奉战争，使这里的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除军队在边境、驻防中奸淫、抢掠、抓车、拉夫和溃兵游勇的骚扰外，战争需要的粮食、车马、草料、修路、民夫，以及临时需用的战争费等等，都是就地向农民勒索摊派。在摊派过程中，军阀政府的官吏和豪绅地主，层层加码，乘机发财。当时此种负担在不少村庄占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不等。

二是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仅凭个人记忆：除田赋、田房契税等正税外，还有田赋附加、预征田赋、换契、验契、“旗地变民”、警察捐、民困费，以及烟酒、牌照、食盐、花果、山货、木材、皮毛、肠衣、猪鬃、苇席、布线、草帽辫、水利等费，不下数十种之多。有些捐税是不断提高税率，有些是巧立名目种类日增。这些捐税大部分由政府以投标方式，包给豪绅地主或他们的爪牙，在征收过程中多方勒索敲诈，农民不胜其苦。

三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及经济剥削。那时全县八个区、二十四保、七百多个自然村，上至区董、保董，下至村正、村副，形式上是由豪绅地主们推举，实际上是由他们当中有势力者把持操纵。他们除利用军阀战争乘机发财之

外，并以雇工、出租、变相增租、高利贷、商业投机、贪污舞弊等等手段，侵吞榨取农民的财产。广大农民敢怒而不敢言。

党的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兴起

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和一九二五年的“五卅”运动，全国革命形势出现高潮。一九二五年夏，江浩同志（本县刘家桥人）根据我党北方区的指示，率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叶善枝（本县鸦鸿桥人，后叛党）和玉田在京、津读书的一些学生来玉田进行革命活动。利用每年举行一次的全县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，控诉在“五卅”惨案中，英、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，宣传全国各地人民反帝、反军阀斗争的革命形势，和国民党改组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决议；在进步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些国民党员（我也参加了），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分部的组织。不久，又先后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建立了中共玉田县党支部，受天津地方委员会领导，肖志斋任支部书记（此时我已由北方区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）。此外，还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进行了增资斗争，并取得了胜利。同时，经过江浩同志的活动，调换了保守的县教育局局长王锦堂，由王秀江（本县小丁庄人，当时为国民党员，不久加入共产党）接任。一度掌握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，利用这一有利条件，开展了革命活动（主要是在小学教师中）到一九二六年北京“三·一八”惨案后，由于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冯玉祥及其所属军队，被直系和奉系军阀战败，京、津和直隶省又被直、奉军阀统治，革命形势恶化。玉田的反动势力乘机迫害国民党员，王秀江和肖志斋难以立足，六、七月间，由组织派往苏

联学习，王佩青调天津工作，县里仅有我党党员李立元一人，成立不久的党支部无形撤消，国民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。

一九二六年九月，中共北方区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和重新建立玉田党的组织，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派我（当时名张金言（为农委特派员回玉田工作，和我一同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肖荫堂同志（现名肖尊一，当时为共青团员，不久转党）亦回县工作。十月间，农委又派来曾在开滦煤矿工作的杨春林同志（丰润县杨家口头村人）为农运特派员。化名李震之，和我一起工作。此时，已有党员八人，在尚不具备成立县委的情况下，根据北方区的指示，成立了中共玉田特别支部，直接受北方区的领导。特支委员会，由我和杨春林、李立元三人组成，我任书记，杨任宣传委员，李任组织委员。从此，农运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开展起来。随着农运的发展，党的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间，经北方区批准，正式成立了玉田县委，以后改为中心县委，统一领导玉田、遵化、丰润西部和蓟县东部的的工作。

组织起来反抗“旗地变民”

为了启发农民革命觉醒，我们编印了一些通俗易懂，以政治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材料，通过我党党员和进步的小学教师（包括国民党员），以夜校、平民学校，宣讲、讨论会等形式，在农民中进行活动。主要是宣传农民受苦的原因；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等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；北伐战争和南方农民运动的胜利；号召农民组织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，打倒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；废除苛捐杂税等等。经过这些宣传，

结合农民的迫切要求，我们于农历十二月初，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地反抗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。

“旗地变民”是军阀政府向农民勒索的一种捐税。“旗地”又称旗租地，是清朝贵族（人民称满族人为旗人）入关后，用跑马占圈的方式霸占农民的土地，成为他们的领地，但仍由当地的农民租种，每年向领主缴租。以后年代久远，领主不断发生变化，有些地租改由政府征收，农民也可以自由买卖或转租这些土地。辛亥革命后，这些土地全部由政府征收地租，农民称之为“旗租地”。实际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农民的（有些地主富农也有这种土地），仅在交纳的租额上，有的高于一般田赋。当时军阀政府强迫种旗地的农民，以每亩三、五元至十数元不等的代价，换契立照，美其名为买得“旗地”的所有权，即所谓将“旗地”变为民有地。

一九二六年冬，统治河北的奉系军阀政府加紧催征“旗地变民”的税款。限令农民如期交款，领照换契。一方面以逾期不交，加税罚款和没收土地，由政府拍卖相威胁；另一方面以提成分红等办法，奖励协助催征的官吏豪绅。玉田的“旗地”分布很不平衡，大部分在北部、中部一带，占各村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至百分之七、八十不等；绝大多数农民，甚至一部分地主富农都有不同数量的“旗地”。当时估计全县将此款交齐，至少五十万银元以上，此时正值农历年关，粮价低、银根紧，许多农民如将款交齐，就要倾家荡产。因此，反抗“旗地变民”成为当时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。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立即以反抗“旗地变民”为中心，在农民中展开工作，号召联合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抗交税款。由于当时农民对农民协会的名称和组织感

到生疏，尚有许多疑虑，遂用他们熟悉而易于接受的联庄会名义，动员他们入会。这一组织原是为了防匪自卫，修建庙宇、防洪治水而设的，由三、五村至十数村联合组织的，领导权一般由地主富农掌握，而且是合法的，农民没有多大的顾虑。

农历十一月中旬，首先在城北东蒙各庄小学召开了二十多个村的农民代表会议。这个村的小学教师王文俊也是代表，参加了会议。在会上，我们介绍了各地农民，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，取得胜利的情况，激发和提高他们对斗争的决心和信心。讨论了抵抗的办法，决定以各村互相串联、签名、按手印的办法扩大联庄会，发展会员。约定入会后，行动一致，一律不许擅自交款，如军阀政府因催征传讯捕人时，传讯或逮捕一人，全体会员一致救援。会后，我们和这些村庄入会的积极分子连夜活动，十数日间，扩大到五十余村（主要在城北、城东一带），签名入会的农民二千余人（一人代表一户）。长期受苦受难的玉田农民，初步组织起来了。

火烧县议会捣毁县衙门

年关迫近，军阀政府催征税款越来越紧，县公署派出衙役警察到各村传讯办事人，限期交款，以逾期不交，即来捕人和拍卖土地相威胁。党组织研究了这一形势，连夜召开了第二次农民代表会议。会议决定利用农历腊月初八县城的集日，全体会员到县城请愿。会上，有的代表对到县城集体请愿有顾虑。主张写呈文或派几个代表要求政府缓征。经过讨论，照顾到有些农民怕见县官的情况，决定全体会员到县议会请愿，要求他们替农民向政府交涉延期征收。并推举出指挥这次行动的负责人。

临近年关的集日，赶集的人特别多。腊月初八上午十一时左右，请愿的群众和临时参加的群众约三千多人。由农民代表率领，齐集在县议会门前，当代表们进入县议会找县议员交涉时，发现他们已逃匿一空。我们当即鼓动群众，说县议员们是喝农民的血，吃农民的肉的土豪劣绅，是给军阀、贪官污吏办事的，催交税款，他们可以分肥，决不会替农民办事，要打倒他们，直接到县衙门找县官交涉。农民积累多年的仇恨和愤怒，再也抑制不住了。于是，一片呼喊：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“打死县议员”和各种激愤的叫骂声，犹如雷鸣，一齐拥进县议会。搜查不到县议员，将县议会的门窗和一切家具什物捣毁，将公文卷宗和议员们的衣服被褥，聚集在院中付之一炬。

此时群情鼎沸，斗志昂扬，在县议会的行动约一个多小时，随即由指挥行动的负责人率领奔向县公署。沿街宣传鼓动，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，当到达县公署门前时，已近万人。县长事先已得悉群众在县议会的行动，作了准备。此时，他派人要农民派几个代表到县衙内谈判，群众怕代表被扣，异口同声地说“我们都是代表”，要县长出来答话。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，县长被迫出来后，态度十分蛮横，拒不答应，并威吓群众说：“冀地变民是三、四方面军团部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违抗”，“违抗不交的要按军法从事”，还骂群众是“刁民”等等。交涉约一小时毫无结果，群众再也忍耐不下去了，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，当县长威吓群众说：“你们简直要造反”之后，他事先安排好警察所长（县长的内弟）在旁，立即向空中鸣枪，企图驱散群众，不想激起群众的更大愤怒，立即高呼“打倒贪官污吏”、“活捉杀人的赃官”等口号，一拥而上，县长和警察所长见势不妙，仓惶逃走，群众随后追赶，当县长爬上墙头时，被农会会

员孙庆田以木棒击中腿部，负伤越墙逃走。这时群众犹如潮水般地涌入县公署，激愤之下又将县公署的门窗什物全部捣毁。

乘胜扩大斗争，农会正式诞生

火烧县议会，捣毁县公署以后，广大群众斗志昂扬，以为干得痛快，但部分群众认为闯下了大祸，甚至产生退出联庄会的念头。我们及时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做了简短的鼓动，指出“今天的行动干得对，干得好，取得了重大胜利。多少年来老百姓受尽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压迫怕他们；今天，他们怕老百姓了。但斗争并未结束，需要更加团结，扩大组织，只要大家齐心斗争到底，什么也不怕”。与此同时批判了闯下了大祸，企图退出联庄会等错误言论和恐慌动摇思想。并向群众宣布，次日在城北麻山寺召开全体会员大会，商定下一步的行动。

为开好全体会员大会，党组织分别在城内和麻山寺召开了两次骨干分子会议。主要内容是：1、有胆小怕事，工作不力的代表要撤换。将联庄会改为农民协会，和全国各地统一名称；2、乘势扩大农民会组织，发展新会员，规定土豪劣绅地主不许入会；3、如官府下乡抓人，一家有难，全村支援，一村有难，村村支援；4、连夜起草呼吁书和新闻稿，向京、津报社投稿，揭露县官与土豪劣绅借“旗地变民”损公肥私的罪行；5、派人到北京探听军阀政府的动静，以谋对策；6、农民协会的名称，不易为百姓接受，因为“协”字易误解为“邪”字，干脆叫农民会，且不能公开，仍保留联庄会名义，以应付官府；7、农民会员必须保守会员和代表秘密；8、为了各村有事能互相支援，建立标牌制度，类似抗日时期，抗日根据地的鸡毛信，只是用木制成的一种信符，一般附有文字通知，有时亦由传递人口头传达。

翌日的群众大会，到会的农民代表和会员两千多人，当我们根据两次骨干分子会做出的各项决定，向群众作了具体宣传解释之后，群众情绪非常高涨，一致表示赞成，最后通过决议，正式成立了前所未有的农民自己的组织——玉田县农民会。

抗捐抗税连续胜利，部分村庄农会当权

党领导玉田农民反抗“旗地变民”之后，对农会经过短期整顿，很快地就展开了抗捐抗税斗争。自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九月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发动各种方式的抗捐抗税斗争达数十次，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。在群众斗争的巨大压力之下，县公署不得不取消了屠宰税、牲畜税、斗称捐、花果税、鸡蛋捐、鸡鸭捐、皮毛税、肠衣税、烟叶税、警察捐、民团费、食盐税等十几种捐税。抗捐抗税斗争，是从斗争官盐店开始的，玉田离芦台盐滩很近，当时军阀政府实行食盐专卖，不但卖价比盐滩的卖价昂贵得多，而且掺入水土，缺斤少两，农民对这种苛刻的剥削十分痛恨。在腊月中旬的一个玉田集上，农民发现盐质低劣，斤两不足，又目睹售盐人员向盐堆上泼水，便与官盐店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将店内食盐无偿分给买盐的群众。经过这场斗争，官盐店被迫降低盐价，不敢再泼水掺土、克扣斤两了。农民冲破了官府不许私人贩盐的禁令，直接到盐滩运盐。继此以后，其它抗捐抗税的斗争不断出现，捐税也再无人敢承包了，军阀政府只得直接派人收税。官府税收人员下乡收税经常被农民打跑，有的农会干脆规定会员一律不交捐税。收税人员在集镇上向农民收税时，农民就说：“你们也不睁眼看看，我是农民会，我想交税，就怕你们不敢要。”税收人

员慑于农民的威力，不敢再收税了。此后，收税的范围仅限于那些没有加入农会的农民。这样就更加提高了农会的威信，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会，促使农会在全县迅速发展。

随着抗捐抗税斗争的胜利，农民觉悟的提高，革命运动逐渐向深入发展。由于多少年来，豪绅地主独揽农村政权，他们不仅私立会账，侵吞公产公物，隐瞒大量黑地，并以举办公共事业为名，向群众任意增租派款，借以贪污自肥。群众迫切要求清算他们的账目和清查他们的黑地。县委和县农会研究了这一情况，决定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开始，在土豪劣绅当权的村庄，农会要团结全村的群众，清算他们掌管的账目，清查他们的贪污和为逃避负担隐瞒的黑地，反对不合理的负担项目和摊派办法，实行累进的合理负担。在清算斗争中，把村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在没有土豪劣绅的村庄，则不搞清算，由农会和群众商议，实行合理负担，由农会掌管村政权。合理负担的暂行办法的原则是：1、取消按户的土地数平均负担，改为按各户人口平均土地数累进负担；2、规定免征点和起征点每人平均不足若干土地者免征；3、规定累进基数和等级，按每人平均土地多少分等级，土地多的逐级累进。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，在农会较好的村庄，不同程度地逐步开展起来。斗争搞得好的村庄，查出豪绅地主贪污舞弊，侵占公产，隐瞒黑地，逃避负担等种种罪证，迫使他们赔偿漏交的负担，退还贪污侵占的公款公产，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项目，撤换他们村正、村付职务，由农会推举新的办公人；实行了合理负担。

反对警察所长司乃德的斗争

警察是统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。当时，县设警察所

区设警察分驻所，均配有一定数量的警察，他们驻在各区的经费都由农民负担，农民对此早已不满，自反抗“旗地变民”后，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极端恐惧和不安，派来以蛮横著称的司乃德为玉田警察所长。司到任后，即派遣亲信任各区巡官，秘密调查农会的活动，并制造谣言，说：“农会就是‘赤化党’，‘赤化党’实行共产共妻”。扬言捉住赤化分子一律枪毙，并多次派警察下乡寻衅。因而更加深了农民对警察的仇恨，县委根据这一情况于一九二七年七月，通过县农会，通知各村一律不交警察捐，迫使驻各区的警察减员或撤走。警察如到各村催捐捕人，即集合群众与之斗争。这年秋天，城东亮甲店警察分驻所的巡官见各村拖欠警捐，屡催无效，遂以抓赌为名，亲率警察到户部庄、芦庄子一带捕走农会会员二人。当时我和杨春林正在附近村庄开会，闻讯立即发动各村农民进行武装拦截，抢下被捕的农民，俘获警察一名，巡官乘马逃脱。据被俘的警察供认，这次巡官下乡，是警察所长的指使，其目的是企图破坏农会，抓捕干部，作催警捐的试探。为争取主动，先发制人，粉碎敌人的阴谋，我们决定立即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抗议，由农会发出传牌，通知所有会员携带武器，到村东五里的行宫集合。次日，先后到会的群众约一万人，大部分持有武器。这是玉田农民在建立农会后第一次大集会。会上宣布此次斗争的目的和意义，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赞同。

在农会俘获警察和巡官逃跑的那天，警察所长即派人交涉，要求放回警察，并以抗交警捐、截留人犯、扣押警察、私设公堂等罪名相威胁，而群众在行宫集结时，县长又派人来谈判，表示农民要什么条件可以考虑，但是必须解散群

众，于是我们提出下述四条：

1、立即取消警察捐。因农民已向政府交纳许多捐税，不应再征警捐。

2、严惩下乡扰民的巡官，保证以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。

3、惩办警察所长，并令其亲自向农民赔礼道歉。

4、群众是否解散，是群众自己的事，与政府无关。

条件提出后，县长几次派人往返交涉，讨价还价。当浩浩荡荡的队伍到达东关时，县长慑于群众的威力，不得不接受全部条件，叫警察所长司乃德沿着长长的群众行列，当场向群众赔礼道歉。

这次斗争的胜利，使阶级力量和斗争形势的对比都发生了新的变化，清算夺权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深入发展。农会掌权的村庄日渐增多，原来没有农会的村庄纷纷要求县、区建立农会，自一九二七年一月农会建立至同年十月，农会的发展，已由五十余村扩大到五百多个村庄，约占全县村庄的百分之六十，农会会员已达六万多人，同时，玉田农会组织已扩大到遵化、丰润、蓟县。遵化二百多个村庄有了农会，会员约两万人。丰润、蓟县也各有三十多村建立起农会（这两县农会参加玉田农会活动，会员计算在玉田会员之内）。

暴动前夕的形势

一九二七年下半年，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由于汪精卫所代表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叛变革命，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联合反共，国民党已由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变为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的专政工具。在革命的紧要时刻，我党在南昌举行了“八一”起义，开始了由我党领导的

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新阶段。在北方，由于北伐战争中途夭折，使行将崩溃的北方军阀统治又得以苟延残喘，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破坏和镇压。

警察所长司乃德镇压农运的企图失败后，敌人对农会更加害怕和仇恨。为了破坏农运的发展，他们一方面在防匪自卫的口号下，加紧组织反革命武装，命令各区限期成立民团，购买枪支弹药，准备窥伺时机，对农会进行镇压；一方面调查农会和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以及各级干部的名单，用造谣诬蔑、威胁利诱等手段，破坏农会组织；各地豪绅地主也借机蠢动，没有农会的村庄，极力阻挠、破坏成立农会，有农会的村庄则拉拢收买地痞流氓，组织假农会；在抗捐抗税与清算斗争中，有些地主富农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参加了斗争，有的还当了农会干部，当运动逐渐深入，危及其切身利益时，他们就消极畏缩，从中阻挠破坏。

由于中心县委的工作重点在玉田，故玉田的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发展较快，全县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村庄农运工作开展的很好，在已建立农会的五百多个村庄都有活动，但是在豪绅地主统治较强的玉田南部许家桥、窝洛沽、石臼窝一带，农民运动尚未能开展起来。由于农民运动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，故一些村庄农会的活动还带有一定的自发性。此外，玉田、遵化、迁安、蓟县的北部山区有大小数十股土匪。参加土匪的虽然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，这些土匪对扰乱和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，也起着一定的作用，但是他们滥行烧杀、绑架，也危及到农民的安全和障碍着农民运动的开展。

县委根据上述情况和问题，采取了下述措施。